

论李大钊的儿童教育思想

常进军

(滨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李大钊十分关注儿童的生存发展和教育状况,重视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他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开阔儿童视野,尤其要注重对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李大钊的儿童教育思想对于现在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儿童教育;早期教育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20-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03

Study on Li Dazhao's Thought on Children Education

CHANG Jin-jun

(School of Marxism,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hildren's living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early education. He advocated that education should respect children's nature, broaden children's horizons, and especially cultivate children's good moral character. Li Dazhao's thought on children education can offer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present school and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children education; early education

李大钊十分关注儿童的生存发展和教育状况,重视对儿童实行早期教育。虽然他没有专文论及儿童教育,但从其著述里,从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也不难理解其儿童教育思想的真谛和意义。

一、关注儿童生存发展和教育状况

儿童的生存发展和教育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虽然李大钊对此有着诸多关注与思考,但是他较为全面深入地论及这一问题则是缘于他1924年的苏联之行。短暂的访苏之旅使李大钊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目睹了在新制度下苏联少年儿童的快乐生活和良好教育状况,它与旧制度下中国孩子的悲惨命运形成了鲜明对照,更激

发了他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豪情与责任。

(一)苏联儿童的快乐生活和良好教育

1924年6月中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苏联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大钊曾赴多地参观访问,目睹了苏联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期间,李大钊还特别调研了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状况。

1924年夏天,李大钊曾到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参观访问。此地原为莫斯科贵族及资产阶级避暑之地,有多处别邸建于丛林之间,十月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4WH04)

作者简介:常进军(1970—),男,山东莘县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革命胜利后皆被政府没收,当时多为工人及儿童避暑之用。在那里,李大钊得以了解苏联童子军少年团的生活。看到他们训练有素、组织有力、气度非凡,李大钊十分激动,他说:“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1]17}李大钊坚信,这些孩子身上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但能冲破旧家庭的束缚,而且是人类解放与世界和平的有生力量。他断言:“这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们的旧家庭,实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缚人类的一切锁链。”^{[1]18}

1924年9月初,李大钊还参观了列宁格勒(旧名圣彼得堡)近郊一儿童村。此地原为皇家村,俄国沙皇的夏宫就位于此,其附近则遍布俄国贵族的休闲之地,当然当时已被收归国有,成为苏联儿童和少年生活与学习的处所,而且考察期间,热情的女管理员向李大钊介绍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状况。李大钊殷切期望中国人民“努力于改造世界的运动”,苏联人民坚定地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并积极“在那里为我们训育后备军”^{[1]19}。

(二)中国儿童的悲惨命运

在新制度新社会里苏联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并受到良好的教育,李大钊一方面为之振奋并备受鼓舞,另一方面更感到救国救民责任之重大。在那样的时刻,怀有忧国忧民之心的李大钊怎能不想到中国儿童的悲惨命运呢?他充满悲情地说:“吾跻身于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1]27}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儿童们不仅受保守落后家庭的束缚,更遭受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压制与摧残。与苏联儿童的幸福、快乐相比较,中国“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1]27}。

在苏联期间,李大钊撰写了《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以上海童工为个案,对旧中国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作了介绍和评论,对给他们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严重摧残的剥削制度予以严正声讨。

在旧中国,儿童非但不能幸福快乐地生活,

就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被剥夺,更谈不上接受良好的教育了。为生活所迫,有些儿童还不得不沦为童工,生活极其悲惨。在上海“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1]24-25}。童工们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低,这些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含有结核性的病症,流行极多,而以上海为尤甚。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1]24}

(三)只有推翻旧社会才能使中国儿童获新生

少年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理应在幸福的家庭健康快乐地生活,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但在军阀混战、盗匪猖獗、民不聊生的旧制度下,这些无疑皆化为泡影。对儿童们的悲惨遭遇,李大钊极为同情,他说:“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听他们的剥削而不自知,真可怜啊!”^{[1]25}如何使儿童们摆脱悲苦的生活、凄惨的命运?如何使儿童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当然不能指望剥削者的仁慈,更不能寄希望于北京政府的“仁政”,而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此,李大钊呼吁:“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同;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不可。”^{[1]26-27}

二、重视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

儿童时期是人脑生成、发育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早期教育不仅能很好地开发孩子的智力潜能,而且能使其性格得到最优化的培养,从而为孩子以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李大钊一直对儿童早期教育有所关注与研

究。1923 年他旅居上海时,从一家日本书店购得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木村久一撰写的《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因“读之颇有趣味”,故写信将其介绍给好友吴弱男^①。信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儿童早期教育的关注,而且对作者有关儿童教育优越性的观点也深表赞同。

(一)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有助于智力开发

李大钊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能最大限度开发他们的智力,为日后成长成才打下基础,使他们日后有“非常的成就”。他在信中简述了书中几个早教成才的案例,其一是美国心理学名家 Boris Sidis 博士的儿子 Willian James Sidis,从一岁半时,便受教育,三岁时能以本国语自由写读,六岁入小学,八岁入中学,十一岁入哈佛大学,成绩极佳,尤其擅长高等数学;其二是达芙兹大学神学教授 Berle 博士的儿子 Adolf Berle,十三岁半即入大学,仅用三年就完成大学学业;其三是一个名叫诺尔巴特·维纳的少年,十岁入达芙兹大学,十四岁毕业,继又入哈佛大学大学院,年仅十八岁,已得哲学博士学位。对此,李大钊强调说:“这几个少年,都不是偶然特出的神童;都是教育的结果。”“他们的将来,实在有望。”^{[2]214-215}

(二)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对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意义重大

李大钊指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身的成长,更重要的是能极大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为什么古希腊在雅典极盛时代,全国人口不过五十万,却“人才辈出,灿如列星”?李大钊认为,“早教育实为其要因”^{[2]216}。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是希腊人的习惯,正是通过这种做法,希腊人培养出了大批闻名于世的优秀人才。

(三)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有益于身体健康

有人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会危害他

们的身体健康。对这种自古至今不少人持有的观念,李大钊并不认同。他转述了书中列举的几个早教长寿的例子加以佐证:大物理学家汤母逊,十岁入哥拉斯科大学;经济学者、政治学者、伦理学者和哲学者穆勒,自三岁时即习希腊语,十八岁能自由读希腊书,从八岁起,学希腊语,十六岁时,他的论文已出现于新闻杂志;德国著名诗人 Goethe,八岁即能以德语、法语、意语、希腊语及希腊语读书作文。这都是早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他们不仅成就非凡,而且身心健康。汤母逊享年八十三岁,穆勒六十七岁,Goethe 亦八十三岁^{[2]216}。因此,李大钊坚信“早教育并无害于健康”^{[2]216}。

(四)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必须方法得当

儿童早期教育是助力儿童成长成才的全面教育,不能仅注重对他们智力的开发,更应关注其健全人格、身心和谐、情感养成、精神塑造等。所以说,儿童早期教育的成功,有赖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要互相借鉴、及时总结和推广。

李大钊不但希望把国外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的经验和方法“一一介绍之于国人”,而且更希望吴弱男“把自己的家庭中的教育经验写出来”与人们共享^{[2]217}。

三、李大钊儿童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李大钊认为,重视儿童教育不能只注重其知识信息的积累和技能的掌握,而是大力倡导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注重对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

天性是自然对人的发展的规定性,是人身上的自然属性。童年是人生最自然的时期,是天性保存得最完全的时期。对儿童的教育就是要发现和发展其天性,以更好地促进其学习能

^① 吴弱男(1886—1973),安徽庐江人,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夫人。1901 年赴日本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1905 年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英文秘书。1927 年 4 月李大钊被捕,她设法积极营救,后又筹款 3000 元,赡养遗属,她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者之一。建国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

力的提高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并引导其健康快乐成长。

1. 学玩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游玩是儿童的天性之一,儿童玩耍的过程就是其初步感知和适应生活,并获得生活技能的过程。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小孩子“游玩无用废时”,他们“应该把有用的时间作有用的事”^{[3]72}。李大钊认为,人们必须改变这种旧有的教育观念,还孩子们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他认为,小孩子玩耍绝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增益的生活的准备”,“是自然的训练的表现,是自然的学校的一部分,是第一级的课程”^{[3]72-73}。因此,李大钊强调,“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3]73}。他举例说,“一个小猫捉住一条丝,便龙骧虎跃的玩耍起来,全是为将来捕鼠生活的预备。小猫依此以发展他的爪与眼机,借此可以训练他,使他能够在短促的时间获得食物。小羊的游玩,亦是预备他的刍食的生活。一个男孩子总是喜欢玩些建筑,创造获得的动作。一个女孩子总是喜欢玩那抱弄小儿的事,作母性的准备”^{[3]72}。可见,李大钊并没有把孩子们的玩耍视作单纯的休闲娱乐活动,而是同他们生活的训练以及未来的发展紧密相连,由此揭示了儿童玩耍的本质及意义。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李大钊很好地践行着读书和玩耍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理念。据李星华回忆,父亲经常给子女们谈论自己小时候读书学习的经历和体会,由此教导他们学习的时候认真地学,学累了脑子用疲倦了就要痛快地玩,“不要一天到晚地坐在那里念死书”,他的结论是“要玩就得玩个痛快;要学就得学个踏实”^{[4]27}。

2. 保持好奇心,丰富想象力

想象力也是儿童的天性之一,它是指人在头脑中创造一个念头或思想画面的能力。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中,李大钊不只是关注他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更注重保持和发展他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李星华回忆说:“父亲愿意把我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他常说:要经常叫孩子

们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有机会或者坐上小船,象鲁宾逊那样不怕风险,在海心里漂流漫游,那也是很有趣的事。这样做,既能锻炼孩子们的胆量,还能使孩子们胸襟开阔,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4]176}为此,在日常生活中,李大钊总是设法给孩子们提供接近自然、锻炼胆量和意志的机会。比如,在1919年暑假期间,李大钊一家人从北京回故乡河北乐亭时就进行了一次有趣而惊险的水上旅行。那一次,他们从北京乘坐火车到达滦州车站后,没有走陆路,而是乘坐帆船沿滦河顺流而下到达乐亭。途中,孩子们在船上尽情地嬉戏,欣赏滦河两岸的美丽风光,听父亲讲有趣的故事,真可谓其乐无穷。

(二) 注重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

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儿童时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不仅会使其自身终生受益,而且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1. 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要从儿童抓起

李大钊在幼年即遭不幸,在他未出生时父亲李任荣就因病去世,母亲周氏在他不满两岁时也撒手人寰,是年逾六旬的大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虽然李如珍年事已高,但他并没有放松对李大钊的教育,特别是“怎样做人”的教育,“他教育李大钊从小就懂得应怎样做人,懂得‘做人之道’”^{[5]77}。这对李大钊的成长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皆有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一生道德情操高尚,令后人景仰。他主张人的全面发展,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并指出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必须从儿童抓起。同时,李大钊强调,对儿童的教育“不宜加以压制”,而应当“循循善诱”^{[3]8}。也就是说,对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应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从生活中感悟到真实的道德情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而非强制地向他们灌输抽象的道德内容。

李大钊认为,音乐不仅能陶冶人,而且还能振奋精神和鼓舞人心。所以,他时常在歌唱中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据李星华回忆,她和哥哥

葆华在孔德学校求学期间,父亲经常听他们唱歌、教他们唱歌,并且借此给他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使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比如,李大钊教子女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并且给他们讲解歌词的意思。李星华回忆说:给她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再就是,“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4]144}听了父亲对歌词的讲解,以及父亲常给他们讲起的故乡的一位大伯常年累月劳动而不得饱暖的故事,使他们对广大劳苦大众有了深深的同情,对那些不劳而获、剥削别人劳动果实的寄生虫产生了憎恶之情。

2. 培养儿童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至关重要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注重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对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和良好品质的养成至关重要。李大钊出生于农家,之后虽然走出农村生活在城市,但勤劳质朴的习性伴随其终生。他认为,“劳动乃愉快的非痛苦的,自由的非强迫的”^{[3]75}。李大钊时常告诫子女要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他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4]149}因此,他经常寻找机会让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使他们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并由此而更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尊敬劳动者。

比如,李大钊很喜欢跟孩子们一块儿下军棋,但他从来没有买过棋子和棋盘,而是和孩子们一起自己动手做。他们找来红色和绿色的硬壳纸,取来浆糊和剪刀,从如何做棋子、画棋盘,到摆阵势、走棋子,李大钊都耐心地教给孩子们。他对孩子们说:“用自己做的棋子来下棋,是非常有趣的事!”^{[4]159-160}这样,孩子们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再比如,在寒冷冬天下大雪时,李大钊非但没有让孩子们待在温暖的房间里,还鼓动他们到院子里去玩雪、打雪仗。他说:“让他们到外

面去跑吧。让孩子们在雪地里跑跑,对他们的身体是很大的锻炼!”^{[4]147}地上的雪越来越厚,李大钊就跟孩子们一块儿清扫积雪、堆雪人,忙得真是不亦乐乎。李星华回忆说:“哥哥拿着扫把扫雪,父亲端着簸箕撮雪,有时他也帮着哥哥扫。我跟在父亲后面,也帮着撮雪。我们扫着雪,父亲不住嘴地讲着:‘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就没有饭吃!’”^{[4]147-149}那一次,李大钊还给孩子们讲了“劳工神圣”的道理,讲了劳动人们当家做主在苏联真正变成了现实。这样,李大钊不是用简单的说教,而是在亲身实践中让孩子们体验劳动的快乐和劳动人民的伟大。

(三) 注重开阔儿童视野

读书能开阔视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提升能力。李大钊特别注重儿童的读书教育,儿童通过读书扩大了知识面,锻炼了思维能力,也懂得了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李大钊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当蛀书虫,他认为钻到书堆里念死书的人,长久下去,会变成一个蛀书虫。他强调,要称得起一个顶呱呱的好学生,应当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他说,考第一名的学生,往往抵不上考第二三名的学生能力强。因为考第一名的学生里面有些人思路一点也不开阔,除了死啃书本以外,对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不关心。他告诫孩子们,“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扩开扩视野才好”^{[4]166}。

为此,李大钊指导孩子们看各种各样的读物,既有中国古代诗词,如北朝民歌《木兰辞》、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唐代杜甫的《石壕吏》和自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等;也有近代小说,如《太平天国演义》《义和团演义》和《清宫演义》等,还有时尚新作,如《东方文库》^①和《呐喊》等。读过这些课外读物,再加上李大钊的讲解指导,孩子们不仅“眼界和知识面逐渐扩大”,而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更增(下转第 32 页)

① 《东方文库》是为纪念《东方杂志》二十周年于 1923 年出版的一套刊物,王云五主编,共计 82 种 100 册。内容涉及教育、自然科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史地、戏剧、艺术等方面。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运动回忆录[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13]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J]. 新青年, 1920, 7 (2).
- [14] 夏征农, 陈至立, 熊月之, 等. 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465.
- [15] 刘维薇. 李大钊北京十年: 学会篇[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260.
- [16] 北京游览指南[M]. 北京: 新华书局, 1926: 61.
- [17] 张耀杰.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358.
- [18] 顾明远. 中国教育大系: 历代教育名人志[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5: 707.
- [19] 清水安三.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M]. 李恩民, 张利利, 邢丽荃,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0] 张菊香. 红楼奠基的深情——周作人与李大钊[J]. 党史纵横, 1994(7): 8-10.
- [21] 赵泓. 中国人的新村梦[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 [22] 张菊香, 张铁荣. 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157.
- [23] 周即平. 李大钊与周作人[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04.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24 页)加了对广大贫苦民众的同情。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李大钊培养以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后备力量为目标, 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提出了丰富的儿童教育理论并付诸实践, 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 是一份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2006.

- [2] 李大钊. 李大钊书信集[M]. 周芳, 李继华, 宋彬, 编注.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4] 李星华.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5] 朱文通. 李大钊年谱长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李亚平)